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书后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胡平

一、成书背景及其它

诚如英国历史学家卡尔所说，要了解一本史书的意义，先要了解史家本人。如能略知写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时期陈寅恪先生的生活环境与时代背景，当能有助于我们对该书的了解。

据书后之《附论》，知此书完成于1940年4月，时作者大病初愈，居于昆明青园学舍¹。《附论》中所说大病，当指作者于1940年1月30日所发之心脏病。据陈先生自己所述，“此次之病甚不轻，即心悸心跳，所谓怔忡者是也”²。由于病情较重，影响了正在进行中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的写作，至1940年2月底，“尚欠一章论财政者未成”³。此书的书名初看似只是研究隋唐制度之渊源，但陈先生的想法却不仅如此，他其实是把此书当作《通史》来写的，因此才有“极费力”的感慨。⁴至4月，陈先生虽已完成书稿，但因尚欲有所修正，而自己眼疾之症又十分严重，故7月间仍致信傅斯年，请他托人代为抄写一份。⁵该书起初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印行，陈先生虽极度不满商务印书馆往往改易原稿之病，但为尽早出版，乃亲自详看一遍，仍交付商务出版。⁶尽管如此，由于正值抗战时期，时局动乱，故该书迟至1942年仍然未能刊行。

当时战事方殷，陈寅恪先是困居香港，准备应牛津大学之聘，等候赴英，然1939年欧战爆发，无法成行，陈寅恪又迁回内地，居于昆明，后又迁至桂林。在此数年当中，陈寅恪一家生活物资极其匮乏，家人多患病，真可谓是饥寒交迫、穷困潦倒。⁷除此之外，图书乃学者治学最为重要之工具，而因战乱之关系，陈寅恪“二十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⁸。其中包括陈先生花费极大心力的《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以及蒙古与佛教等方面的大批重要书籍，幸存的“仅不经意之石印《旧唐书》及《通典》二种”⁹。正是根据《通典》和《旧唐书》之眉批，陈先生才在几乎无书可读的情况下，完成了《隋唐制

¹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75页。

² 《致傅斯年之三十九》，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64-65页。

³ 同上书，第65页。

⁴ 同上。

⁵ 《致傅斯年之四十》，《书信集》，第67页。

⁶ 《致傅斯年之四十一》，《书信集》，第68页。

⁷ 同上。

⁸ 《致刘永济之四》，《书信集》，第244页。

⁹ 同上书，第245页。

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之作。¹⁰陈先生论史一向极重种族与文化二端，在明了陈先生著书前后的时代背景及其生活环境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何以陈先生在书中不惜笔墨的论述隋唐制度渊源中的“河西因子”之重要性，“借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¹¹实则陈先生值中华民族与文化危亡之际，身处西南一隅，对“河西因子”之体悟颇能感同身受也。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陈寅恪先生不得不经常求助友人借阅和代查书籍。在1939年十一月间，陈先生托陈述代查严衍对《通鉴》一七九隋纪“仁寿二年闰十月甲申，诏杨素、苏威与吏部尚书牛弘等修定五礼”条有无补正之处。¹²由于陈述没有准确体会陈寅恪的要求，故两日后，陈先生再度详细说明要求，即欲知该条上文有无异文。¹³按，陈先生反复托人所查之文字，正是有关隋唐礼仪制度来源之关键所在。《略论稿》在《礼仪》章中引用了上述文字，陈先生加以按语，指出《隋书》、《北史》载文帝诏修《五礼》，时在该年闰十月己丑，其前则有“甲申诏仆射杨素与诸术者勘定阴阳舛谬”条，而《通鉴》则把修定《五礼》之事系于甲申，因此陈先生颇为怀疑《通鉴》有所脱误。¹⁴这也正是他托陈述代查严衍与章钰二书有无补正的目的所在。虽然严、章二书皆未对此做出补正，不能使陈先生利用《通鉴》的记载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质疑。事实上，陈先生在此处本欲证明牛弘等人修定《五礼》是以北齐《仪注》为准，《隋书》对此已有明文，而《通鉴》未采，故陈先生大发感慨，以为司马光未能通解隋代礼制之大源。¹⁵陈先生对宋代史学的成就十分敬仰，尤其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认为“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¹⁶正是本着对司马光的推崇和尊重，陈先生才特别希望能从《通鉴》逸文中找到只言片语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在这种努力失败后，陈先生表示出了极大的遗憾。由此，我们一方面可见陈先生在解读史书方面出类拔萃的洞察力，同时也能感受到陈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他对前代学者的尊重。

二、成就与争论

一部仅十几万字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包含了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与隋唐制度及其建置相关的内容，涵盖了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民族学、社会学、

¹⁰ 《致刘永济之四》，《书信集》，第245页。

¹¹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47页。

¹² 《致陈述之十一》，《书信集》，第190页。

¹³ 《致陈述之十二》，《书信集》，第191页。

¹⁴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7-18页。

¹⁵ 同上书，第18页。

¹⁶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79页。

考古学、文化史、语言文字学等与中古史相关的诸多领域，显示了陈寅恪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中西文化的关系、种族与文化的界定、胡化汉化的实质等问题的高见与卓识。

陈先生在此书中提出不少通识宏论，对后来的研究具有开启范式的意义，但在所有这些论断之中，有关“南朝化”的论述引起的争议似乎最为持久和激烈。笔者姑就浅见所及，对相关争论略作整理与评析。¹⁷

“南朝化”一语见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七章《财政》，陈先生指出，“此章主旨唯在阐述继南北朝正统之唐代，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¹⁸按，陈先生的意思是唐代中央财政制度本继承北朝，而后则逐步转向南朝。而对于其他制度，如礼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认为隋唐制度主要有梁陈（南朝后期）、北魏北齐、西魏北周三个来源。其中西魏北周一脉属于鲜卑野俗与当地汉文化的混合品，对于隋唐实际影响甚微。北魏北齐一脉主要是王肃等人从南朝（前期）输入北朝者，较为重要。同样重要的是来自于梁陈（南朝后期）的一脉。由此可见，虽曰三源，实则整个南朝的影响明显居于首要位置。陈先生在这里虽然没有采用“南朝化”的说法，但是他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东汉以来的文化传统主要经由东晋南朝再传至北朝隋唐的脉络，因而继承了汉魏传统的南方文化就构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对于这种特别重视南朝贡献的观点，钱穆先生有极为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近人陈君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详举唐代开国，其礼乐舆服仪注，大体承袭南朝。然礼乐制度，秦汉以下，早有分别。史书中如职官田赋、兵制等属制度，封禅郊祀舆服等属礼乐。宋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辨此甚明。隋唐制度，自是沿袭北朝。陈君混而不分，仅述南朝礼乐，忽于北方制度，此亦不可不辨”。¹⁹可以说，钱先生的批评对陈先生的结论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在此后的长期探讨中，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基本上形成了赞成“南朝化”说和主张“北朝主流”说的两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唐长孺先生及其弟子牟发松等人，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有田余庆先生及其弟子阎步克等。

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进一步发挥了陈先生的观点，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但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²⁰可见，陈先生提出的在中央财政系统的“南朝化”概念被唐先生用来描述唐代各方面制度的发展趋势。但两位学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唐先生认为唐初的主要制

¹⁷ 主要参考阎步克、胡宝国、陈爽等“关于南朝化的讨论”，详见 <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2/92.html>。

¹⁸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56页。

¹⁹ 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见其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三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²⁰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度承自北朝，而直到中期以后才出现了所谓“南朝化”的重大变化。这样一来，唐先生就成功地化解了钱穆先生的质疑。牟发松则更进一步的发挥唐先生的学说，认为南朝化实际可以追溯到北魏孝文帝改革时期，因为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时大量采用了东晋南朝的文物制度。实则早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对这个过程已有详细叙述，可见此种观点仍然源自于陈先生。

田余庆先生则在《东晋门阀政治》的《后论》中，从宏观上清晰地阐明了“北朝主流说”，他认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²¹但并未展开论述。此后，在吴宗国先生主编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和《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中，特别是由阎步克执笔的部分，详细地梳理了隋唐各项政治制度的源流及发展，指出其中大部分都来源于北朝尤其是北周，而非南朝，从而发展和完善了“北朝主流说”。

如果我们综合考察上述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其实不难看到二者间的共通互补之处。事实上，两种观点最大的不同，是在考察时段的长短。相对而言，北朝主流说着眼于较短的时段，因此其所看到的北朝因子更多，毕竟隋唐政权是继承北朝而来。“南朝化”的观点则更多是从较长的时段来观察，因此能够看到在中唐以后出现的许多重要变化中，南朝的因子更为突出。如前所述，陈寅恪先生所揭示的隋唐制度的三个主要来源中有两个属于北朝系统，加之隋唐是北周政权的继承者，因此，北朝的影响在唐前期无疑要更大一些，但由于南朝的社会发展水平较为先进，在之后的发展中，南朝的先进制度逐渐取得了优势，尤其是当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主要仰赖东南财赋的支持，因此南方的制度尤其是财政方面的制度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这也正是陈先生首先以“南朝化”来解释中唐以后中央财政制度发展趋势的意义之所在。在此，我们不妨套用田先生的话来说，从宏观来看隋唐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前半期的主流在北，而后半期的主流在南。

²¹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6页。